

用智慧指引中小企业前行方向

2013中国中小企业发展高峰论坛激辩改革与稳健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3月30日—31日,由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北大青鸟集团联合主办的“2013中国中小企业发展高峰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成功举办。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秦志辉、北京大学校长助理黄桂田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司司长郑昕、中国企业报社社长吴昀国、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武常岐等来自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近200名嘉宾应邀出席。

本次论坛以“稳健成长——在改革中前行”为主题,针对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现状和多年来一直存在的融资难、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信息缺乏、企业管理水平低、市场竞争能力弱、整体素质不高问题进行深度讨论,尤其是在世界经济持续下行,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国内资金、劳动力、原材料等成本不断上升的巨大压力下,为中小企业的未来发展寻求新的方向。以下是论坛嘉宾的观点选粹。

良好的企业治理 是企业发展的基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马骏:有些人认为企业治理是大公司关心的问题,中小企业不必关心公司治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企业治理也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基础。良好的企业治理是企业整合人才、资金、社会关系等资源的基础,也为科学决策创造条件。企业治理的变革包括,将独资企业改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不断调整公司的股权结构;集资、集智、集贤,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

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是重大战略任务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司司长郑昕:中小企业是推动技术创新、



促进结构升级和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担当者,是扩大就业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渠道,尤其是在促进就业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小微企业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其中小型微型占55%以上;创造了60%的国内生产总值、59%的税收和60%的进出口;完成了65%的发明专利以及75%以上的新产品开发。中小企业对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有重要意义,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小企业是“草”, 政府是“牧人”

中国企业报社社长吴昀国:小企业好比草原上的小草,中型企业是食草动物,大型企业是食肉动物。在整个经济环境中,小企业处于基层,有着基础性作用,为大中型企业的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规模小,资金少,并不影响企业的“好”。小企业首先要做的是把企业做“活”,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其次才是求“大”,求“强”。在这个生态圈中,政府应该扮演“牧人”的角色,管理好草、食草动物和食

肉动物,增强对企业的尊重,协调好各方的利益关系。

网络时代企业 需要协同创新的思维

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蔡剑:由于人力资本和投资资本的速度差距,中国已经进入了人力资本的鸿沟。要减小人力资本的鸿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创新价值观念。观念的转变最关键的是思维的转变,价值观念的创新源是人的思维。在网络时代,企业的创新管理需要协同创新的思维方式,将批判思维、设计思维、经济思维、美学思维和生命思维五种创新思维相结合,通过这种思维方式实现网络时代企业的创新管理。

企业转型 面临重重体质障碍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武常岐:中国的成长型企业升级转型面临重大挑战,在体制方面矛盾重重。

行政垄断和地域限制以及体制深层次的矛盾,如劳动力市场上的矛盾是体质障碍的重要表现。例如北京中关村和深圳高新区对比,前者具有高校林立、资源雄厚、政策优势,后者没有重点高校、研究基础相对薄弱、地域也有相对的劣势,而华为、中兴、迈瑞、比亚迪等国内一流的大型企业却诞生在深圳。这种很有意思的现象也可见体制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专长和个人魅力 影响未来领导权

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吕峰:专长和个人魅力将影响未来领导权。领导者权力的构成可以分为:法定权、奖励权、惩罚权、专长权和个人魅力影响权。其中前三个来自于组织赋予的权力,后两项权力是未来领导权构成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小企业的发展,企业员工越来越年轻化,更多的80后、90后来到企业。对于这样一批年轻化的群体,由于“人变了,队伍不好带”,他们对领导权的服从更多的来自于公司领导的专长和个人魅力。

对话

城镇化的重点在于消除制度障碍

——专访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

■ 本报记者 蒋皓

蔡继明是当之无愧的“土地委员”。十年来,他作为政协委员写了30份土地提案。今年两会,作为人大代表的他又写了一个土地议案,并征集了34个代表联名。他呼吁要尊重农民自主城市化的选择,特别是不要把城镇化变成国有化。

《中国企业报》:为什么我们习惯的提法是“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

蔡继明:我们有19000个镇,如果只讲城市化,那么这19000个镇怎么办?但我个人一直用“城市化”这个概念,我觉得“化”是发展的方向。城市化的重点应该放在大中城市,当然也包括小城市。19000个小镇都要发展必然会造就过去“村村点火、户户冒烟”、60000个小镇遍地开花的局面,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环境的严重破坏,而这些小镇根本不能发挥城市的功能。

《中国企业报》:从目前来看,“人口城市化”的步子明显赶不上“土地城市化”的步子,应该怎么解决?

蔡继明:城市化的本质应该是“人口的城市化”,是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的转变。当然,这个转变是以工业化、非农就业为前提的,离开了工业化,离开了非农就业,就是“被迫上楼、被迫进城”,这个肯定不是城市化的本来含义。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空间的城市化。改革开放以来,空间的变化提高了3—5倍,而人口转变的速



蔡继明

度远远不够。我国现在的城市人均占地大概133.3平方米,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城市有那么多空置的房子,只要制度合理,让这些房子被“吐”出来,再加上保障房建设,现有的城市空间规模已经能够容纳这些人口。

十年来,作为政协委员我提了30份提案,别人说我是“土地委员”。今年,作为人大代表,我提了一个议案。议案跟提案不同的是,必须有30个代表联名,我征集了34个代表。这个议案是关于修改我国《土地管理法》的建议。关于《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已集中讨论了多年,去年年底,国务院法制办把最后一个版本提交给了人大常委会讨论,但没有付诸表决。

这个版本只修改了一条,就是“取消30年农业收入的上限”。有人担心这个取消了,征地成本会增加,会造成“一夜暴富”的现象。还担心农民暴富?农民暴富总比开发商暴富要好吧!

《中国企业报》:您说过,《土地管理法》的修改最重要的不是“征地标准”问题,而是“征地范围”要确定,为什么?目前的门槛那么高,如何才能让农民顺当当地进城落户?

蔡继明:如果是百分之百的土地要征,当然征地标准就很重,我们要讨论的仅仅集中在20%的耕地。如果80%的非公共利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在符合城乡规划的情况下,自主进入市场交易,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群体事件以及出现农民对征地补偿标准不满意,甚至扬言要杀人的极端现象。建议《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应该严格按照宪法规定的公共利益作为唯一的征地依据,非公共利益就要允许集体土地进入市场,而且不仅包括建设用地,耕地也同样可以进入市场。

这些地为什么一定要征收为国有之后才能转变用途呢?为什么一定要先“变性”才能“变色”呢?“变性”是指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变色”就是农业用地变成非农业用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现在大概有17万平方公里,如果节省出1/3集约使用,进入市场后就会打破政府对建设用地的独家垄断。垄断打破了,地价肯定降下来。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小产权房进入市场,房价也会降下来。地价降了,房价降了,老百姓就可以买得起房,租得起房。三千六百万套廉租房、保障房不仅可以面向本地居民,也可以面向外地迁徙的农民工、刚毕业的大学生。这样就降低农民工进城落户的门槛。

锐视角

以对外开放促进改革 是重要信息

■ 林玲

3月29日上午,李克强总理在上海召开的企业座谈会上提出,要促进跨国公司亚太运营中心向中国转移,以开放促进改革。作为新一任总理,他向世界昭示了一种决心,即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发展之路,通过开放来促进深化国内市场机制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

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抱怨和疑虑,是李克强总理此番表态的一个背景。大市场、低成本、人口红利、制度红利……在近几十年内,中国诸多独特的优势,吸引了巨额的外资投到这片热土。然而,近几年来,情况在悄然改变,土地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外资逐渐实行国民待遇……于是,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抱怨和疑虑多了起来。

对跨国企业的抱怨和疑虑,是另一个背景。跨国企业在世界的发展壮大也是其本国具有政治话语权和成为世界经济体的重要因素,以至于中国是否应该加入WTO都一直存在争议。

在这种背景下,李克强说要抓住金融危机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得机遇,促进跨国公司亚太运营中心向中国转移,甚至提出以开放促进改革,就更为令人关注了。

座谈会上提到的“上海综合保税区”是国务院于1990年在上海设立的一个特殊经济区域,过去吸引了100多家世界500强的跨国企业入驻,成为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象征。这些跨国企业正逐渐将在上海的运营中心升级为地区总部。在这个地方李克强说这番话,自然是最合适的话。

自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至今,跨国企业最明显的贡献就是为中国引进了外商的直接投资,据普华永道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高达1117亿美元。有如此巨额的外资注入,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不仅为国内发展提供了资金,也带动了国内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而且这些跨国企业每年都能给政府提供20%左右的税收,是我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跨国企业就像扔进一群沙丁鱼中的鲇鱼,给国内企业群体带来的就是竞争。但竞争并不总是带来消亡,相反它们会让国内企业产生活力,迫使国内企业进行改革,提升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从而增强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生存下来。从政府层面而言,为了给跨国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必然会让因此加快完善整个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对其中不适合经济全球化的问题进行改革,同时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依靠资源和人口红利向绿色经济、创新经济转变。

但事物都有两面性,跨国企业涌进中国市场也可能给国内经济带来一些损害。中国市场潜力虽大,但跨国企业抢夺市场的实力和劲头更大,这对本身就经营惨淡的大部分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还有人担心,跨国企业虽然给中国带来了发展资金,但也有可能在获得商业利益之后将利润带回本国,造成中国的资金外流。

虽然有一些不利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引进跨国企业对深化国内改革,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是有利的。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中国也不可能再闭关自守。对外开放也是对内改革的一个动力和诱因,以开放促改革,通过改革实现更好地开放。

中国政府制定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策,要把转变增长方式,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作为一个重要战略。因为去年中国GDP总量占全球的9%,但是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已经占到全球的17%,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约束就是资源、能源和环境。中国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作为未来5至10年的核心战略,这个战略实施的期间,跨国公司将提供新的刺激。

据普华永道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在3月初对全球227位跨国企业CEO的调查显示,中国仍然是全球投资的首要目标,但其他主要经济体正在威胁这一地位。因此,要促进跨国企业的运营中心向中国转移,使中国保持外商投资首要目标的地位,政府就要为它们提供一个好的投资环境。对中国政府应该如何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环境,跨国公司诸多选项中,“提高透明度和加强反腐败力度”所得到的票数远远超过其他选项,居于榜首。排在第二位的是“减少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鼓励私营企业参与竞争”。

李克强总理以跨国企业为题,表达了中国政府以开放促进改革的决心,在当前无疑是重要信息。

漫评



新“国五条”颁布后,网上流传着“离婚避税秘籍”,据说可省下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交易税。如今,北京“国五条”细则落地,从3月31日起对拥有北京户籍的单身人士限购。这真是“楼市有风险,离婚需谨慎”。

王利博制图